

资料使用说明

考古代文学科目，多数同学后期的困惑是：教材内容庞杂，知识点零散，背诵时没有一套看起来足够充实、完善的笔记，背完后还是感觉心里虚，或者是背诵的内容本身不条理，没办法在考场上组织成有效答案。这份笔记的编写目的，就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以下说明，它将直接关系到你的复习效率。

一、笔记的价值：不止是整理，更是为应试而重构。市面上的笔记多为教材的精简或罗列，而这份笔记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套基于考研实战逻辑，经过深度二次创作的备考系统。

1. 高度原创与精细化。你看到的95%以上内容，并非教材原文照搬（大概只有不足10道题，是沿用了教材上的经典表达，比如“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而是我消化多版本教材后，用更适合背诵、更具逻辑层次的语言重新进行的表述。它将不同教材来源的内容融为一炉，让你无需再多方对照，真正实现“一书在手”，直接可用。

2. 丰富且好背的“案例阐释”。文学史大题失分，往往在于“只有理论，没有举例”。本笔记的优势之一，就是为每个重要知识点都配足了案例，并对案例进行了具体的展开说明。也就是，不仅有论点和论据，还有论证的过程。有时候，大家的答案看起来存在“两张皮”的现象，就是因为例子跟观点的割裂，缺乏对例子三两句话的进一步说明。恰恰是这几句话，构成了答案内部的“经络”，是相当重要的。例如，讲到《诗经》的“比”，不仅告诉你《硕鼠》是典型，要说明它是如何通过“整体比喻”，将剥削者比作贪婪老鼠来表达主题的。这能让你在考场上做到有理有据，论述丰满。而且，有例子也能辅助理解，避免死记硬背，让你真正理解论述对象的真正含义。

3. 彻底的“题目化”结构。我已将所有知识点，无论是名词解释还是论述题，都预先处理成了考场上可以直接使用的“答案模块”。你的背诵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强的目的性。每道题内部，都做到了要点分明、逻辑清晰。告别大段论述，采用分点式结构，不仅便于背诵，更能帮你形成条理清晰的答题逻辑。

4. 重要性星级标注。根据历年真题考察频率和学科重要性进行重要性标注，助你合理分配复习精力，详略得当。

二、怎样背诵才能“事半功倍”？

请不要用传统“通读-划线-死记”的方式对待这份笔记。遵循以下步骤，你的效率会大幅提升：

1. 先理解，再记诵；先框架，后细节。先要看明白每道题的内部逻辑是怎样的，彻底吃透一个知识点为什么要这么拆解，它的一二三四点，分别是哪个角度来谈的，不同要点之间的顺序有没有讲究。务必要先思考和处理知识，再进行背诵。在记忆的时候，也要分层次，每道题至少要有两层，也就是做到知识点的合理分类与收纳。越是规整存储的知识点，在提取的时候就越轻松。

2. 分配精力，主次分明。严格参照【▲重要性星级标注】。核心考点、重要考点是你必须投入 80%精力的地方，要达到能脱口而出的程度。对于非重要考点，则以理解和熟悉为主，能用自己的话阐述就好。

3. 主动复述：这是检验背诵效果的唯一标准。合上笔记，看着目录，尝试用自己的话把一个“答案模块”复述出来，包括核心要点和关键案例。说不出来的地方，就是记忆盲区，立刻翻开笔记，用红笔标记，重点巩固。

三、进阶不停：从“背诵”到“理解”。

背诵能保证你拿到基本分，但要想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必须实现从“背诵”到“理解”的跨越。当你在背诵一个“模块”时，请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时期会出现这种文体？不同流派的观点差异在哪里？笔记中详尽的案例阐释，就是为了激发你的这种深度思考。只有真正理解了，知识才会成为你自己的东西，才能在考场上灵活运用，写出让阅卷老师眼前一亮的答案。

这份笔记是我多年授课经验的凝结，希望能实实在在地帮你解决问题，节约时间，提高分数。

另外，我们提供的是考研综合服务。你购买的不是一份纸质版笔记，而是我们的全年服务。纸质版笔记，是内部讲义。我们提供全年免费答疑服务，有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我微信：yiwangwenxue004 进行咨询。

最后，祝你备考顺利，成功上岸。



一往文学
yiwangwenxue

为后代诗人取之不竭的艺术源泉。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考点分析】

先秦叙事散文的成熟过程、《尚书》的概念与特点、《春秋》的概念、微言大义、《左传》的艺术成就、《左传》的思想特征、《国语》及文体特征、《国语》的文学特色、《战国策》的文学成就、《战国策》的人物塑造、《战国策》的纵横家思想、先秦历史散文的地位与影响。

【版权提醒】本笔记为内部学习讲义，属原创智力成果，仅限购买服务的学员本人使用。严禁以任何形式翻印、复制、扫描或进行网络传播，侵权必究。备考中有任何疑问，请随时联系微信：yiwangwenxue004 咨询。】

【知识点精讲】

一、名词解释：《尚书》

《尚书》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经典文献，它是虞、夏、商、周四个时代记言史料的汇编，具体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这部文献主要辑录了上古时期一些重要人物的讲话、誓词、命令以及部分史事记录，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汇编之一。《尚书》的文字风格古朴典雅，语言表达技巧相较于更早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有了显著提升。其篇章独立成篇，结构相对完整，叙事和议论能力有所发展。虽然其文风古奥难懂，但作为记录历史言论的典范，《尚书》对于先秦时期历史叙事散文的进一步发展和最终成熟，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古代记言散文的基础。

【一往助记口诀】：《尚书》古文献，虞夏商周记言，记言散文基石。

二、名词解释：《春秋》

《春秋》原泛指周朝及各诸侯国按年记事的史书，意即一年四季、代指历史进程。后来，“《春秋》”特指经过孔子修订和整理的鲁国编年史。这部史书极为简练地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事件。《春秋》的叙述风格极其简约，仅以寥寥数语概括重大史事，呈现出大纲式的特点。其显著特色在于，虽然记事精炼，却常常在遣词用字中暗含褒贬，体现作者的价值判断，这种微言大义的写作手法被称为“春秋笔法”。这种独特的表现手法对后世的历史记载和文学创作，特别是叙事和评论的结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往助记口诀】：《春秋》鲁国编年史，孔子修订，微言大义法。

三、名词解释：春秋笔法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以鲁国历史为核心的编年体史书，详细记录了鲁国从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的史事。它本是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史书的通称，后特指经孔子修订并被儒家奉为“五经”之一的鲁国史，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经典。其最为独特的贡献在于开创了著

名的“春秋笔法”。这并非直接议论，而是一种“微言大义”的叙事方式，即作者在极度精炼的文字中，通过对史实的简略记述、严谨的措辞以及特定的字眼运用，巧妙地灌注强烈的褒贬感情和道德判断。《春秋》的主要思想倾向在于维护周礼、匡正名分，坚决反对僭越违礼的行为，并对邪说暴行予以严厉贬斥。这种礼义观念，体现在“一字寓褒贬”的典型实践中：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这些看似简单的用词，实则蕴含着对事件性质、人物身份及行为合法性的深刻评判。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道德情感与政治立场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特别是《左传》《史记》等，提供了重要的范式，对中国史学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往助记口诀】：春秋笔法微言义，一字褒贬藏心意。

四、名词解释：《国语》(▲▲▲)

《国语》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重要的国别体史书，它并非按时间顺序编排，而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记述。全书共二十一卷，汇集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个诸侯国的史事记载，故称为“国语”。这部史书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在《国语》中，不同国家的历史叙述所占篇幅各不相同，且记述的侧重点也各有特点。其文字风格总体上呈现出质朴平实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书中各“国语”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学界有人认为这部书并非完全出自一人之手，而可能是当时各种国别史料的汇编整理。尽管如此，《国语》仍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生动的历史场景，对后世史学和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往助记口诀】：《国语》首部国别史，记八国，战国初，文风朴实。

五、名词解释：《左传》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是中国古代一部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成就的编年体史书，旨在对儒家经典《春秋》的简略记载进行详细的解释和补充，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核心文献。关于其作者，传统上认为其为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鲁国史官左丘明。然而，现代学术界经过严谨考证，对此说普遍存疑，普遍倾向于认为《左传》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由一位或一群儒家学者在继承前人史料的基础上，最终编纂定稿。《左传》的记事范围与《春秋》大致相同，起自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甚至包含少量战国初期的史料，时间跨度长达两百余年。与《春秋》的“一字寓褒贬”的极简笔法迥异，《左传》以其磅礴的气势、丰富的细节、生动的人物描写和曲折跌宕的情节，对《春秋》中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补充。它不仅叙述了战争、盟会、外交等政治军事活动，更深入刻画了历史人物的形象，记录了精彩的对话和言论，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叙事性和文学性。

因此，《左传》不仅是研究春秋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更以其宏大叙事、精湛笔法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成为先秦历史散文的杰出代表，对后世的史学、文学乃至思想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一往助记口诀】：《左传》补《春秋》，记事详细生动，史传散文杰作。

六、名词解释：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是对儒家经典《春秋》进行解释和阐发的著作，包括《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这三部传记从不同角度解读《春秋》。其中，《公羊传》和《谷梁传》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的，因此被称为“今文春秋传”，它们侧重于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和政治伦理。而《左氏传》则使用先秦的古文字写成，被称为“古文春秋传”。秦始皇焚书之后，《左传》一度失传，直到汉代才由北平侯张苍重新献出。与今文二传不同，《左传》更侧重于对《春秋》记载的史事进行详细的叙述和补充，具有更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这三传共同构成了研究《春秋》和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

【一往助记口诀】：春秋三传解《春秋》，公谷今文重义理，左氏古文史事细。

七、名词解释：《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兼具历史文献价值与卓越文学成就的集成之作，共三十三卷。它杂记了战国时期秦、齐、楚、燕、韩、赵、魏等主要诸侯国的军政大事、外交策略。其记载的时间跨度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秦朝统一六国，集中展现了战国时代列国纷争、合纵连横、政治斗争空前激烈的历史画卷。这部书的核心内容在于记录了当时活跃于各国宫廷的谋臣策士们（尤以纵横家为代表）为实现政治抱负而向君主进献的游说之辞、权谋方略以及相互间的论辩智慧。这些文章并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是汇集了战国后期纵横家及其他士人作品的合集，可能也掺杂有秦汉之际文人的润色与补充。最终，由西汉著名目录学家刘向广泛搜集散佚文献，并对其精心编校整理，正式定名为《战国策》，从而使其得以完整保存。《战国策》以其独特的散文艺术风格著称。书中的文章辞采飞扬，逻辑严密，善用夸张、排比、譬喻等修辞手法，将游说者的口才和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极高的文学感染力。它不仅是先秦历史散文的又一杰出代表，更以其雄辩之风和卓越的叙事技巧，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剧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往助记口诀】：《战国策》策士言，游说十二国，辞采飞扬善譬喻。

八、《左传》的叙事特征

《左传》在《春秋》极简的记事大纲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叙述的血肉，将《春秋》“新闻标题式”的记录，发展为情节完整、细节生动的叙事散文，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散文的成熟。其叙事特征主要体现在：

（一）叙事伦理化：继承并发展“春秋笔法”。

1. 隐性褒贬：不同于《春秋》依靠个别字词进行褒贬，《左传》主要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铺陈和对人物言行的具体描绘，来自自然地传达作者尊礼尚德、惩恶扬善的儒家立场和道德评价。

2. 显性议论：开创了在叙事段落之后或之中，直接引述“君子曰”“孔子曰”等形式的史论，明确地对人物或事件进行伦理评判。这种“史论结合”的模式，不仅强化了作品的思想倾向，也增强了叙事的思想深度和感染力。

(二) 叙事结构的复杂化。主体上遵循编年体的时间线索，清晰交代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同时纯熟地运用多种叙事技巧，打破了单一的时间流。

1. 追溯(倒叙、补叙): 常以“初”字为标志，回顾事件的渊源或背景。如《宣公三年》先记郑穆公去世，再用“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姑，梦天使与己兰”来追述其充满传奇色彩的出生。

2. 预叙(伏笔): 通过智者预言、占卜、梦兆等方式，预示事件的结局，增强叙事的张力。如秦晋崤之战前，蹇叔哭师，“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为秦军的覆灭埋下伏笔。

在叙事视角方面，主要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使作者能自由穿梭于不同时空和场景。偶尔也转换为人物有限视角，如鄢陵之战中，通过楚子和伯州犁在巢车上的对话来观察和呈现晋军的阵势，增强了现场感和真实感。

(三) 因果叙述的道德化与神秘化。《左传》极力探求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但其解释常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1. 道德化归因: 将“德”“礼”“信”等儒家伦理观念视为决定事件成败的关键。如总结城濮之战晋国取胜的原因时，明确指出“能以德攻”。

2. 神秘化色彩: 将道德逻辑与神秘现象相结合。合乎礼义的行为常伴有吉兆，违背礼义则多有凶兆。这些预兆通过占卜、梦境、天象等形式出现，用以解释历史的偶然性，并为其道德评判提供超自然的依据。如晋景公之死的叙述，通过桑田巫释梦、小臣之梦印证等怪诞情节，将国君的暴虐与其悲惨结局联系起来，充满了志怪小说的色彩。

(四) 叙事的戏剧性与虚构性。《左传》中的许多历史事件被讲述得情节曲折，充满戏剧性冲突。更重要的是，书中出现了明显的文学性虚构。如介子推与其母在山中隐居时的对话，在逻辑上不可能有第三者在场记录，这显然是作者根据人物性格进行的“代言”，即设身处地的想象和虚构。这种手法开创了后世文学为塑造人物而虚拟对话的先河。

九、《左传》的人物刻画

《左传》通过在漫长的历史叙事中展现人物的言行，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写人手法影响深远。

(一) 人物塑造的两种主要类型

1. 累积型形象: 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其事迹分散在不同年代的记事中。读者需将其历年言行加以整合，才能获得一个完整、动态的形象。如晋文公重耳，通过其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经历和最终成就霸业的系列事件，展现了他从一个贪图安逸的贵公子到成熟政治家的转变过程。楚灵王的形象则更为复杂，既有弑君自立、骄奢残暴的昏君面，又有纳谏、风趣的另一面，呈现出人性的丰富性。

2. 闪现型形象: 许多人物仅在某一特定事件中短暂出场，却以其鲜明的个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一节中，不忍弑君而触槐自尽的鉏麇、为护主而死的提弥明、受惠知报的灵辄，这三位义士的形象在极短的篇幅内被刻画得熠熠生辉。

(二) 以言行刻画人物的手法。《左传》塑造人物的核心手段是将其置于重大的历史矛

盾冲突中，通过其个性化的行动和对话来揭示其性格，极少使用直接的外貌描绘或心理分析。如齐晋鞞之战中，主将郤克重伤后，与副手解张、郑丘缓在战车上的对话，生动地展现了三人在危急关头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十、《左传》记言文字的特色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尤其是大夫的谏言和外交场合的行人辞令³，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一) 辞令的“文典而美”与个性化。《左传》的辞令语言精练典雅、逻辑严密，同时又委婉曲折、富有说服力。经典的范例是《僖公三十年》的“烛之武退秦师”。烛之武的游说，完全站在秦穆公的立场分析利弊，先以“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点明灭郑对秦无益，再以“若舍郑以为东道主”晓以利害，最终不费一兵一卒化解了郑国危机。其辞令因人、因事而异，风格多样，或谦恭有礼，或刚柔相济，充分体现了春秋时期高度发达的外交艺术。

(二) 叙述语言的“词约义丰”。《左传》的叙述语言极为凝练，常以寥寥数语描绘出复杂生动的场面，蕴含丰富信息。如写晋楚邲之战晋军惨败，仅用“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一句，便将败军争相逃命、互相砍杀的血腥混乱场面活现于纸上，极具视觉冲击力，体现了“言近而旨远”的艺术境界。

十一、试述《左传》的文学成就 (▲▲▲▲▲)

(一) 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事件的情节化。《左传》善于运用文学性的剪裁和组织，将枯燥的历史记载转化为情节生动、充满戏剧张力的故事。如在《郑伯克段于鄢》中，作者将一场长达二十二年的政治斗争浓缩于五百余字，通过对共叔段的步步紧逼、郑庄公的欲擒故纵以及其母姜氏的偏私等情节的精心编排，使其起因、发展和结局清晰完整，人物关系紧张，读来引人入胜。

(二) 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左传》通过在历史事件中对人物言行的长期累积或瞬间捕捉，刻画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无论是通过数十年事迹才得以完整呈现的晋文公重耳(从贵族公子到一代霸主的心路历程)，还是在单一事件中闪耀人性光辉的鉏麇、提弥明等义士，都栩栩如生，具有了超越历史记录的文学生命力。这种“于事中见人”的笔法，为后世的人物传记和小说的人物塑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 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左传》以擅长写战争著称，它记叙了春秋时期许多场大大小小的战役，往往注重对双方战前谋划的叙述。以寥寥数笔，刻画人物的风貌，描绘场面的风神，《左传》这类传神的细节描写，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四) 善于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左传》的语言兼具两种风格。一方面，其行人

³这里补充个知识点：行人辞令。“行人”是春秋时期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辞令”指他们在外交场合的言辞。这种辞令讲究辞藻典雅、态度不卑不亢、说理委婉而切中要害，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并且常引用《诗经》中的句子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和态度，由于引用时常断章取义，所以造成了“诗无达诂”的现象。这种用《诗》的方式需要了解。

如“鹬蚌相争”“狐假虎威”“画蛇添足”等，这些寓言生动形象，极具说服力，许多已成为汉语中的固定成语。

2. 夸张铺陈与排比对偶。为了营造强大的气势，文章大量运用夸张、铺陈和排比手法，辞藻华丽，气势纵横。如苏秦游说齐王，极力铺陈临淄的富庶与齐国的强大，文辞瑰丽，一气呵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十四、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叙事散文，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活水，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一）为史传文学奠定了体例与笔法的基础。先秦叙事散文是后世史传文学的直接滥觞。一方面，《春秋》《左传》的编年体，直接为《资治通鉴》等后世史书所继承。另一方面，《左传》《国语》《战国策》中生动的叙事、深刻的人物刻画以及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则为司马迁创造《史记》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司马迁在《史记》中便大量取材并化用《左传》《战国策》的篇章，其“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史家笔法也与之一脉相承。

（二）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典范：《左传》和《战国策》以其卓越的语言艺术，成为后代文章家效法的楷模。唐宋古文运动的旗手韩愈、柳宗元等人，极力推崇《左传》“沉浸浓郁”的文风，以其为榜样矫正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而《战国策》“辩丽横肆”的风格，不仅影响了汉赋的铺张扬厉，其纵横捭阖的气势也在贾谊、苏洵等后世政论家的笔下得到回响。《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到过促进作用⁴。

（三）奠定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先秦叙事散文在叙事模式、人物塑造和思想倾向上，都为后世小说提供了最初的范本。

1. 叙事结构：小说中常见的完整故事链（起因、发展、结局）和灵活的时空处理（倒叙、预叙）直接源于《左传》。

2. 人物塑造：小说以言行和细节刻画人物，而较少进行心理剖析的“白描”手法，正是继承了《左传》《战国策》的传统。

3. 教化功能：其“寓褒贬于史实”的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小说重教化、明善恶的价值取向，“君子曰”的史论模式也演变为小说中常见的作者评述。

4. 题材偏好：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诞生于史学，这使得后世小说和戏剧长期偏爱从历史中汲取题材。

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文

【考点分析】

先秦历史散文的成熟过程、《论语》及其文学特色、《老子》及其文学特色、《墨子》的文学性、“三表法”、《孟子》的文学特色、《庄子》“三言”、《庄子》的艺术特色、《荀子》

⁴这里要注意：最后一点提到了汉赋，是因为汉赋也属于广义的“散文”的一部分。

的文学特色、《韩非子》的文学特色、先秦诸子的寓言

【知识点精讲】

一、简述《论语》的文学成就（▲▲▲▲）

《论语》作为一部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记录孔子及其门徒言行的语录体散文集，其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富有哲理的形象化语言以及充沛的情感表达三个方面。

（一）体制特点：语录体的开创。《论语》的体制呈现出早期说理文的朴素特征。它并非系统性的理论专著，而是由零散、短小的言论和对话片段汇集而成，各篇章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或时间顺序。这种“语录体”形式，虽然在结构上尚显松散，但其在对话中显思想、于记言中见精神的模式，开创了后世说理散文的一种重要范式，对《墨子》等著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文学成就：人物、哲理与情感的融合。

1. 通过言行片段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论语》的编纂者虽无意于文学创作，却在不经意间，通过对言行举止的白描式记录，成功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如孔子的循循善诱与感时伤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子路的耿直鲁莽；颜回的安贫乐道（“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子贡的聪敏善辩。这些形象虽非完整，却生动传神。

2. 以具象化的语言阐释深刻哲理：《论语》善于运用日常生活中浅近的比喻来揭示抽象的道理，言简意赅，余味无穷。例如，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用“松柏”历经严寒考验的自然现象，象征君子在乱世中坚守节操的品格，形象生动。

3. 饱含情感且富有韵律的语言风格：文本中大量运用“也”“矣”“乎”“哉”等语气词，使原本平实的记述充满了丰富的情感色彩和跌宕的语气。例如，孔子赞美颜回时，两句“贤哉，回也！”的重复与感叹，将对弟子的欣赏与赞叹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语言富有感染力。

二、《孟子》的文学特色（▲▲▲▲▲▲）

《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游说诸侯、与各派辩论的言行，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更以其雄辩的艺术、磅礴的气势和成熟的语言，成为先秦说理散文的高峰。

（一）核心特征：气势恢宏的雄辩风格。《孟子》的论辩艺术高超，其文风充满力量感，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

1. 善用逻辑与诘问，层层递进。孟子常采用类比推理和设问，巧妙地设置逻辑陷阱，引导对方顺着自己的思路走，最终使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而无法辩驳。典型如《梁惠王下》中，他与齐宣王论“四境之内不治”，先以“托妻子于友”和“士师不能治士”两个无可辩

驳的小前提让齐王认同，再类推至君主治国之责，使齐王理屈词穷，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2. 巧用比喻与寓言，形象说理。孟子善于运用生动贴切的比喻，将抽象的政治、哲学道理形象化。如用“缘木而求鱼”比喻齐宣王以武力统一天下的做法是背道而驰，形象地揭示了其行为的荒谬性。此外，书中还有如“齐人有一妻一妾”这样情节完整、人物毕肖的寓言，辛辣地讽刺了钻营富贵者的卑劣人格。

(二) 风格来源：人格力量与修辞技巧的结合。

1. 源于“浩然之气”的人格力量。孟子文章磅礴的气势，根本上源于其“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人格修养。这种至大至刚的道德力量，使他面对君主权贵时能够理直气壮，鄙视功利，文章自然充满激情与锋芒，如苏辙所言“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

2. 得于排比对偶的修辞运用。为强化论辩气势，孟子大量使用排比、对偶、叠句等修辞手法，形成连贯的句群，使文气如江河决堤，沛然莫之能御，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三) 语言典范：标准书面语的成熟。《孟子》的语言晓畅明白、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炼准确，彻底摆脱了《尚书》时代的古奥。它继承并发展了《论语》《左传》开创的散文语言，形成了一种深入浅出、表达力极强的风格，标志着中国古代标准书面语的成熟。

三、《庄子》的“三言”(▲▲▲▲)

《庄子》的论说方式极具特色，其《天下》篇自述为“以寓言为广，以重言为真，以卮言为曼衍”，这“三言”是理解《庄子》文本形态和哲学表达的关键。

(一) “三言”的内涵。

1. 寓言：指寄托深刻哲理的虚构故事。这是《庄子》最主要、最核心的表达方式（“寓言十九”），其目的是为了超越个体主观的局限，“藉外论之”，从而更有效地阐明道理。

2. 重言：指征引古代圣贤、名人或尊长的话语（“重言十七”）。其作用是借重权威来增加自己言论的可信度和分量，使听者更易于接受。

3. 卮言：指随心而出、不加预设、自然流淌的言论。“卮”是古代一种酒器，随器倾斜而自然出酒，比喻言论的随机性和无穷性。《庄子》认为这种言论最能“和以天倪”，与自然之道相契合。

(二) “三言”的运用特点。在《庄子》一书中，“三言”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经常融为一体，灵活运用。例如，一篇寓言故事中，可能借黄帝、孔子等“重言”人物之口来展开论述，而整个言说过程又充满了“卮言”式的自由与变化。这种独特的言说策略，使得《庄子》的说理充满了变幻莫测的色彩，避免了僵硬抽象的逻辑说教，而代之以生动、丰富的文学形态。

四、《庄子》的艺术特色(▲▲▲▲▲)

《庄子》是先秦说理散文中最具文学价值的瑰宝。它以其超凡的想象、奇诡的寓言和诗化的语言，构筑了一个汪洋恣肆、玄妙深邃的艺术世界。

(一) 艺术灵魂：汪洋恣肆的超凡想象。《庄子》的文学魅力首先在于其“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受时空、物我、生死界限的束缚，创造出无数奇诡瑰丽的意象，其目的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以象征手法表达玄妙的哲理。

1. 宏大与微小的对比：如《逍遥游》中，北海之鲲化为巨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尽显宏大壮阔之美；而在《则阳》篇中，蜗牛角上的触氏和蛮氏两国为争地而战，“伏尸数万”，则以极度的微小来讽刺人世间战争的荒谬。

2. 物我转化的奇幻境界：“庄周梦蝶”的故事，模糊了现实与梦幻、自我与外物的界限，形象地表达了“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思想。

（二）论辩风格：形象恢诡的非逻辑论辩。《庄子》的说理，不同于《孟子》的逻辑逼问，而是一种以形象、境界来完成的诗化论辩。它常常用一个意蕴深长的寓言来代替逻辑推演。在《逍遥游》结尾与惠子的辩论中，庄子并未直接反驳“大而无用”的指责，而是通过“不龟手之药”的寓言说明“所用之异”，最后描绘了将无用大树植于“无何有之乡”，“逍遥乎寝卧其下”的自由境界，以艺术感染力超越了逻辑辩驳，实现了“大辩不言”。

（三）语言特色：汪洋恣肆的诗化语言。《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自由奔放，多用长短错落的句式、铺陈排比和奇崛的词汇，富于节奏感和音乐美，具有散文诗的特质。如《齐物论》中描绘“大块噫气”一段，运用大量比喻、拟声词和排比，将无形的风描摹得千姿百态，气势磅礴，是古代散文辞赋化的典范。

五、《韩非子》的散文特色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文章风格鲜明，以其冷峻犀利的论辩和富含哲理的寓言，在先秦说理散文中独树一帜。

（一）文风：峻峭犀利，分析透辟。韩非之文，锋芒毕露，说理如解牛之刃，直中要害。其文风冷峻、刻薄，充满实用主义色彩，分析问题鞭辟入里，毫不留情。如代表作《说难》，深刻揭示了向君主进言的重重凶险，对君主的心理、进言者的处境、言谈的技巧进行了极为细致、冷静乃至冷酷的剖析，其逻辑之缜密、观察之深刻、言辞之犀利，令人不寒而栗。

（二）寓言：数量最多，植根现实。《韩非子》是先秦诸子中运用寓言数量最多的著作，并开创性地将寓言分门别类，辑成专集（如《说林》《喻老》）。其寓言特色鲜明，风格与《庄子》迥异。不同于《庄子》寓言的奇幻浪漫，韩非的寓言大多取材于社会现实和历史故事，冷静、简短、功利性强，旨在形象化地论证其法、术、势的政治主张。比如：《守株待兔》讽刺固守旧法的保守主义者；《自相矛盾》揭示逻辑上的悖论，论证法令必须统一；《郑人买履》讥讽墨守成规、不顾实际的教条主义；《棘刺母猴》通过一个骗局被揭穿的故事，说明考察臣下能力必须有客观标准。这些寓言构思精巧，语言简练，思想深刻，许多已成为流传千古的成语。

六、先秦说理文的影响（▲▲▲▲▲）

先秦说理散文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也以其成熟的体式、丰富的艺术手法和卓越的语言成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后续发展。

(一) 确立了说理文的基本体式与方法。它开创了从语录体、对话体到结构完整的专题论文体（《荀子》《韩非子》）的演进路径，为后世议论文的体制奠定了基础。其将逻辑思辨、情感抒发和形象描绘融为一体的说理方式，成为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

(二) 开创了影响后世的文学风格范式。诸子散文风格各异，成为后代作家模仿和汲取的源泉。《孟子》气势磅礴的文风，深刻影响了唐宋古文家，韩愈、苏轼的文章便多有孟子之风。《庄子》超然物外的想象和汪洋恣肆的文笔，启迪了李白的豪放诗风和苏轼的豁达词风，并为后世浪漫风格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荀子》《韩非子》的论辩严谨、分析透辟，也为贾谊、晁错、王安石等政论家的文章提供了范本。

(三) 推动了寓言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先秦说理文中的大量寓言，因其生动的形象和深刻的意蕴，逐渐从说理的工具中脱离出来，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对后世小说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

(四) 奠定了后世文学语言的基础：诸子皆为语言大师，其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比喻、排比、对偶、夸张等修辞手法在此时已运用得炉火纯青。更重要的是，它为后世提供了不计其数的成语典故（如缘木求鱼、守株待兔、庖丁解牛等），至今仍是汉语中最具生命力的组成部分。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考点分析】

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屈原的生平与思想、“楚辞”的概念、《楚辞》的编纂与篇目、《离骚》的主旨与结构、《离骚》的象征体系、《离骚》的文学成就、《九歌》的内容与表现特色、《九章》的内容与特色、《天问》与《招魂》、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知识点讲解】

一、名词解释：楚辞（▲▲▲▲▲）

“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彼时它已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和专门的学问，地位显赫，与儒家“六经”并列，共同构筑了汉代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特指以中国南方楚国地方特色乐调、语言及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瑰丽意象创作的诗赋。这种风格与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现实主义诗歌风格迥异，展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在形式上，楚辞突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多采用长短句相间、篇幅宏大的结构，并频繁以“兮”字作为语气助词，形成跌宕起伏、回环往复的独特音律美。其直接渊源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间歌谣，深植于南方巫文化与神话传说之中，因此作品充满了神秘、诡谲而又奔放的情感与奇幻想象。西汉末年，著名学者刘向系统辑录整理了以伟大诗人屈原（如《离骚》《九歌》等）为代表，以及宋玉等楚地文人的作品，首次编纂成《楚辞》一书。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浪漫风格文学的滥觞和先驱，对后世汉赋、魏晋南北朝诗歌以及唐宋以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文学史上南方文学的独特地位。

【一往助记口诀】：楚辞楚风诗，屈原宋玉作，南方特色浓。

二、名词解释：《九章》（▲▲▲▲）

《九章》是诗人屈原创作的一组重要抒情诗歌的总称，这组作品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共计九篇诗歌。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九章”这个名称并非屈原本人所定，而很可能是西汉时期刘向在整理编订屈原作品集《楚辞》时，为了方便分类而加上去的。《九章》在内容上与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有着相似的主题和情感基调。它们都集中表达了屈原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个人政治理想的破灭、遭受谗言被疏远放逐的悲愤，以及坚持高洁志向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这些诗篇通过叙述个人的坎坷身世和不幸遭遇，展现了屈原忠贞爱国而不得志的悲剧形象，是他内心情感和政治诉求的集中体现。

【一往助记口诀】：《九章》屈原九篇，主题似离骚，抒情悲愤高洁志。

三、名词解释：《九歌》（▲▲▲▲▲）

《九歌》是收录在《楚辞》中的一组重要作品，其起源具有特殊的性质。它原本并非伟大的诗人屈原完全原创，而是深层根源于广泛流行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祀歌舞曲调。屈原在这些古老的祭歌基础上，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性加工、润色与改定，赋予其深厚的文学内涵与艺术魅力，使之得以流传后世，成为楚辞的经典篇章。从现存的《九歌》篇目来看，其内容和形式均鲜明地保留了浓郁的南方楚地地域特色以及原始的巫祭文化色彩。篇中充满了瑰丽的神话想象和神秘氛围，展现出人神交感的独特世界观。尽管《九歌》经过屈原的艺术润色和提升，但与他抒发个人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情怀的其他自叙性作品相比，《九歌》中屈原个人的身世遭遇和思想痕迹显得并不突出，更多地呈现出一种集体性的表达。它更多地反映了古代楚地独特的原始宗教信仰、繁复的祭祀仪式和丰富多彩的神灵观念，是研究楚地巫祭文化、地方习俗的重要资料，也是《楚辞》中富有原始生命力和艺术活力的独特篇章，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往助记口诀】：《九歌》祭祀歌，屈原改定，巫祭风浓。

四、名词解释：《天问》

《天问》是收录在《楚辞》中的一首极其独特且富有哲学深度的诗歌。所谓“天问”，即诗人屈原怀抱深沉的忧虑与不解，对天地宇宙、自然规律以及人类历史中一系列看似不可理解的现象发出连珠炮般的质问，试图探求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根本道理和隐藏其后的奥秘，展现了先秦时期少有的理性思辨精神。全诗共提出了 172 个问题，数量之巨，内容之广，令人叹为观止。其提问的次序大致清晰，先从宏大的天地形成、日月星辰的运行等宇宙创世之谜发问；接着转向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事迹、古老部落的起源；再深入到人类历史的兴衰、帝王贤愚的得失；最终则巧妙地归结到诗人所处时代楚国的现实政治困境和命运，线索虽庞杂却富有逻辑性。《天问》虽叙事包罗万象，充满神话色彩和历史细节，但其核心思想倾向却十分明确。尤其是在涉及天命、历史盛衰、个人功过以及君臣关系等问题时，诗中字里行

坚持就是胜利！每天背诵，迎接最后一战！

间无不透露出屈原对传统观念的怀疑精神，以及他清醒而忧愤的现实政治态度。这首诗不仅是屈原求索真理、追问根源的心灵写照，更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罕见的百科全书式发问体诗歌，对后世文学与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往助记口诀】：《天问》屈原问苍天，一百七二奇问题，天地人事国政全。

五、名词解释：香草美人（▲▲▲▲▲▲）

美人、香草是《离骚》最引人注目的两类意象。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蕴藉而且生动。“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香草美人是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

【一往助记口诀】：香草美人离骚象，喻君喻品格，屈原比兴法。

六、名词解释：风骚（▲▲▲▲）

“风骚”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并称，它囊括了我国诗歌艺术的两大滥觞与典范：“风”特指《诗经》中的《国风》部分，进而代表了整个《诗经》；而“骚”则特指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延伸指代整个《楚辞》体裁。《诗经》作为北方文学的代表，以其质朴写实的笔法，广泛反映了周代社会民生百态、风俗人情，开创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注重诗歌的教化功能和社会功用。“风”之音，温厚平和，其情发乎自然，止乎礼义。《楚辞》则作为南方文学的代表，以其浪漫主义的宏大气魄、瑰丽的想象力、深沉的悲慨和奔放的情感表达，突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局，形成了独特的“兮”字句式。尤其是屈原的《离骚》，充满了神话色彩、奇幻意象和诗人忧国忧民、上下求索的伟大情志，奠定了中国诗歌浪漫主义的基石。《诗经》和《楚辞》因其各自独特的艺术成就与深远的历史影响，被文学史上并称为“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面旗帜。后世的诗人，无论是受《诗经》所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感召，致力于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生疾苦；抑或受《楚辞》所开辟的积极浪漫主义道路影响，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与情感的极致表达，都沿着这两条不同的艺术路径不断探索和发展。因此，“风骚”一词也习惯上指代了中国诗歌中现实风格和浪漫风格这两种并行不悖、共同繁荣的优良传统，深刻塑造了中华诗歌的丰富面貌。

【一往助记口诀】：风骚是诗经离骚，风现实，骚浪漫，诗歌双旗帜。

七、名词解释：《九辩》

《九辩》是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宋玉的代表性作品，也是《楚辞》中除屈原作品外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其核心内容是借萧瑟的秋景起兴，深刻抒发作者因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遭受谗言、被君王疏远、乃至流离失所的深沉悲哀。作品委婉曲折地倾诉了自己对楚国君主的

忠诚不渝，同时表达了对自身不幸遭遇的满腹怨苦。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同时，《九辩》也含蓄地批判了当时楚国黑暗的政治现实，并流露出对国家前途和兴衰命运的忧虑，展现出一种感伤而又兼具爱国情怀的基调。

【一往助记口诀】：《九辩》宋玉秋景悲，抒发愁怨爱国情。

八、楚辞产生的背景

楚辞的诞生，根植于战国时期楚国独特的文化土壤，是多种文化源流交融的产物。其背景可从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来理解：

（一）文化上的二元融合特征：

1. 中原礼乐文化的深厚积淀。楚国统治核心的半姓贵族本源于中原，虽南迁日久，但始终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楚国不仅藏有“周之典籍”，甚至接纳过周王室的史官，士人阶层也自觉学习中原文化。因此，以《诗》《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和礼乐思想在楚国上层社会具有崇高地位，深刻影响了其政治理念与价值取向。例如，楚庄王在城濮之战后表达的“禁暴”“安民”思想，便与中原的礼乐政治精神一脉相承。

2. 南方巫觋文化的奇异底色。楚地是濮、越、巴、蛮等众多南方部族的聚居地，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着浓厚的巫术信仰传统。这种“信巫鬼，重淫祀”的风气，上至王室（如楚怀王寄望于鬼神击败秦国），下至民间，无处不在。这种崇巫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楚地的审美风尚，催生了大量与祭神活动相关的艺术形式，如庙堂壁画、人物帛画、歌舞音乐等，赋予了楚文化瑰丽奇幻、深邃奔放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政治上的由盛转衰。战国中期，楚国一度成为疆域最广的强国，有“纵则楚王”的说法。然而，至楚怀王、顷襄王时期，楚国国势急转直下。对外，屡败于秦，丧师失地，怀王本人更被劫杀于秦；对内，政治日益腐败，贵族倾轧，奸佞当道，贤能被排挤。屈原正是在此国家危亡、政局黑暗的艰难环境中，以其高洁的品格与不屈的斗争，创作出光耀千古的文学篇章。

九、试述楚辞的文体特色（▲▲▲▲）

楚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全新的诗歌样式，其文体特色鲜明，与北方的《诗经》迥然不同。

（一）风格上：宏阔铺陈与奇幻想象。楚辞的普遍风格是情感浓烈，气势磅礴。作者善于运用铺排夸饰的笔法，极尽渲染之能事。更突出的是其汪洋恣肆的想象力，上天入地，神游八荒，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与个人情感融为一体，构建出雄奇瑰丽的艺术世界。如《离骚》中诗人驾龙驭凤、周游天界的描写，即是其奇幻想象的典范。

（二）体式上：句式解放与篇幅拓展。楚辞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整齐句式，开创了长短不一、参差错落的“骚体”。这种句式灵活多变，更适于抒发跌宕起伏的复杂情感。同时，楚辞的篇幅也远超《诗经》中的短章，出现了像《离骚》这样近 2500 字的长篇抒情诗，为文学表达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三) 语言上：活用楚声方言与标志性语气词。楚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宋代黄伯思曾精辟概括为“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诗中大量使用楚地方言词汇，如“羌”“些”“侘”等，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和地域风情。此外，语气助词“兮”的普遍使用，置于句中或句末，形成了楚辞特有的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音乐节奏感，成为其显著的语言标志。

十、《离骚》的释义 (▲▲▲)

(一) 《史记·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之所谓“离忧”，可能涵盖“遭遇忧愁”（“离”训“罹”）和“离愁别绪”二义。

(二) 班固《离骚赞序》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班固解为“遭忧”。

(三)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说“离，别也；骚，愁也。”王逸解为“别愁”。

(四) 近人游国恩《离骚纂义》则认为，“离骚”就是《楚辞·大招》里提到的楚国古曲“劳商”，“劳商”与“离骚”本是双声字，古音可通转，是“一事而异名耳”，也就是说，“离骚”本是楚地的古乐曲名。

十一、《离骚》的思想内容 (▲▲▲▲▲)

《离骚》是屈原的灵魂自传与政治宣言，是一部蕴含着深邃思想和丰富内容的长篇抒情诗。

(一) 对黑暗现实的沉痛批判与救国理想的破灭。诗歌的核心情感基调，是诗人对楚国政治腐败、奸佞当道的深切愤慨，以及自己空怀救国热情却报国无门的巨大悲痛。作品通过对“党人”集团“竞周容以为度”的丑态的描绘，以及对楚王听信谗言、动摇多变的失望，揭示了楚国走向衰亡的内在根源。

(二) “美政”理想的执着求索。《离骚》系统地表达了屈原的政治蓝图——“美政”理想。这一理想，在当时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其核心内涵包括：

1. 明君治国：强调君主必须具备高尚的德行（“览民德焉错辅”）。

2. 贤能辅政：主张“举贤而授能”，效法商汤、夏禹，打破常规任用傅说、吕望等出身微贱的贤才。

3. 法度修明：批判现实“背绳墨以追曲”，强调建立和遵循法度规矩的重要性。

(三) 爱国、忠君与宗族情感的交织。诗人的爱国情感表现得极为深沉。这种情感与忠君思想紧密相连，在封建宗法背景下，忠于君王是实现其爱国理想的唯一途径，因此诗中反复出现“惟灵修之故也”这样为君王“九死不悔”的表白。与此同时，这种爱国情感也与深厚的宗族荣誉感交织在一起，诗中他对先祖高阳氏的追溯，正是这种情感的体现。

(四) 自传性的叙事结构⁵。全诗以诗人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大致分为两部分：

⁵这里“叙事结构”这一点比较特殊，它跟“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关系，大家需要明确。这个结构不仅是故事的时间线，更是诗人情感和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艺术手法得以施展的舞台。具体来说，这种关系体

1. 前半部分，现实回顾：从自叙家世、品德修养与政治抱负，到遭受谗害、理想受挫，充满了对现实的哀怨与不屈的抗争（“岂余心之可惩”）。

2. 后半部分，神游求索：诗人进入奇幻境界，上天入地，“周流求女”，象征性地展现了他在绝望中寻找出路、求索理想的艰难历程，最终因眷恋故土而徘徊不忍离去，凸显了其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

十二、《离骚》的艺术特色（▲▲▲▲▲▲）

《离骚》的艺术成就极高，代表了楚辞艺术的最高峰。

（一）峻洁纯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离骚》成功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个性鲜明的诗人形象。他出身高贵，品行芳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追求“美政”理想，面对黑暗现实与不公命运，展现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信念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探索精神。这一光辉形象，成为后世士人的人格楷模。

（二）“香草美人”的象征体系：屈原极大地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创造了一整套系统的象征体系。

1. 香草：用江离、辟芷、秋兰等各类香草，来比喻诗人自己以及志同道合者的美好品德与高洁人格。与此相对，用萧、艾等恶臭之物比喻奸佞小人。

2. 美人：多用来象征诗人理想中的圣君（“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有时也用来比喻贤臣或诗人自喻。这一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得政治主题的表达更显含蓄、生动、蕴藉，富有艺术感染力。

（三）浓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全诗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与奇幻瑰丽的想象完美结合。前半部分是基于现实遭遇的抒情，后半部分则通过神游天界、求女于诸神等幻想情节，将内心的苦闷、彷徨与执着追求予以象征性的外化。如诗人“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的想象，将对理想的热情与时间的紧迫感表现得气势恢宏。

（四）回环往复的结构与奔放自由的“骚体”形式。诗歌的结构并非线性发展，而是随着诗人情感的激荡而回旋起伏，反复咏叹，形成独特的复沓之美。在形式上，它创造性地运用了句式长短不一、散句与韵语结合的“骚体”，并大量使用“兮”字等语气词，形成了跌宕多姿、极富表现力的节奏韵律，承载了诗人奔腾不息的激情。既采用了民歌形式，也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成为一种句式长短不拘、韵句散语相间的新的文学表现形式。

《离骚》后半表现诗人的思想活动，往往设为主客问答、铺排描写。语言丰富多彩，双声叠韵比比皆是。

十三、《九歌》的艺术特色（▲▲▲▲）

《九歌》原是楚地民间祭神乐歌，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其艺术特色既保留了原始祭祀

现在：叙事结构是思想内容的载体和外化。叙事结构决定并统一了艺术特色的运用。所以，如果你要把结构放在“艺术特色”那道题里，也说得通。关键是要理解这里的逻辑。

的神秘色彩，又融入了诗人精妙的艺术构思。

（一）主题：人神恋爱的浪漫书写。《九歌》最具魅力之处在于将祭神仪式戏剧化为一场场“人神恋爱”。除《东皇太一》（迎神）、《国殇》（祭战鬼）、《礼魂》（送神）外，其余各篇多以主祭的巫（人）与神灵之间缠绵悱恻、若即若离的爱恋为内容，如《湘君》《湘夫人》中双方的相互思慕、求而不得的怅惘，《山鬼》中“若有人兮山之阿”的孤独等待。这种写法，使原本庄严的祭祀充满了浓郁的人间情味和哀婉动人的抒情色彩。

（二）鲜明的戏剧性与表演性。《九歌》是集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具有显著的表演特征。

1. 多角色配置：诗中常以对唱、合唱、独白等形式展开，如《湘君》与《湘夫人》明显是男女双方（或扮作神与巫的演员）的隔空对话，充满了戏剧张力，可视作后世戏曲艺术的雏形⁶。

2. 动作与场面描写：诗中不乏对舞乐场面的直接描绘，如《东皇太一》中“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生动再现了祭祀时的歌舞情景。

（三）情景交融的意境。诗人极善于运用景物描写来烘托人物心境，营造凄美幽渺的艺术意境。典型的例子是《湘夫人》中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清冷寥廓的秋景，与主人公期盼湘夫人不至的惆怅心绪完美融合。同样，《山鬼》中“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的描写，也以萧瑟景物精准地传达了山鬼的孤独与忧伤。

（四）语言清丽自然，音韵优美相较于《离骚》的激越高亢，《九歌》的语言风格更为清丽、柔美，节奏舒缓深沉。无论是写情还是摹景，都辞采华茂，韵味悠长，尤其在传达哀婉缠绵的情感时，更能体现其低回婉转、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十四、《离骚》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屈原及其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全面的影响，鲁迅称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一）高洁独立的士人风骨。屈原“出淤泥而不染”的廉洁品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理想，以及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为后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树立了光辉的人格典范。从贾谊作《吊屈原赋》自况，到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再到李白、杜甫、陆游等无数诗人，都从屈原精神中汲取力量。屈原精神超越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为中国士人注入了刚烈不屈、勇于担当的文化性格。

（二）诗歌样式的革新。开创“骚体”与赋体先河楚辞创造的“骚体”诗，以其自由多变的句式、宏大的篇章结构、奔放的抒情方式，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力。就句式来说，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复，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⁶在回答“戏剧的溯源”问题时，可以写上《九歌》这个来源。

(三) 艺术手法的垂范。

1. 浪漫主义精神。楚辞中热烈奔放的情感、奇幻瑰丽的想象、对神话传说的运用，以及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使其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伟大源头。李白、李贺等诗人的创作，都明显继承了其奇崛的想象与雄奇的风格。

2. “香草美人”象征传统。屈原将《诗经》的比兴发展为系统的“香草美人”象征体系，以男女君臣相比况，以香草喻品德，成为后世文学中一个内涵丰富的母题。从曹植《洛神赋》到晚唐李商隐的无题诗，再到《红楼梦》中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都可见其流风余韵。

【一往知识点补充】

关于《诗经》和《离骚》能否适用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词，学界有不同的争议。这里，我详细把这个问题讲一下。

这个问题的核心争议在于：我们能否，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源于19世纪欧洲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文学思潮，来定义和阐释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时代的《诗经》与《离骚》？

(一) 先说支持方的观点。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与普遍性，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尽管这两个术语诞生于西方，但它们所概括的创作精神和美学特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作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帮助我们理解和比较不同文化中的文学现象。

《诗经》与现实主义精神的一致性在于：

1. 内容上的贴近现实。《诗经》，尤其是《国风》部分，被誉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典范。它广泛涉及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农事劳作、婚丧嫁娶、兵役徭役、以及对统治者的讽刺与反抗。这种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和深切关怀，与现实主义强调“如实反映现实”的核心精神高度契合。

2. 手法上的朴素写实。《国风》的语言质朴无华，情感真挚自然，多采用“赋”的手法，即直接铺陈叙事，不加过多雕饰。这种朴素的写实风格，被看作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早期体现。

《离骚》与浪漫主义精神的一致性在于：

1. 强烈的主观抒情。《离骚》的核心是屈原强烈的自我表现。诗中反复出现的“余”，以及对个人身世、品格、理想和情感的淋漓尽致的抒发，体现了浪漫主义对个人情感和主体精神的高度重视。

2. 奇幻瑰丽的想象。诗人上天入地，驾龙驭凤，与神灵对话，周游天界。这种挣脱现实束缚、驰骋于幻想世界的艺术手法，是浪漫主义想象力的体现。

3. 象征手法的系统运用：“香草美人”的象征体系，将政治理想与个人情志寄托于优美的事物之上，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化和象征色彩。

所以，支持方的核心逻辑是：将《诗经》和《离骚》分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源头，这有助于建立一个清晰的文学史发展脉络，并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一个共通的对话平台。

(二)再说反对方的观点。另一派学者强烈反对这种简单的“对号入座”，认为这是一种“以西律中”的文化削足适履，会遮蔽中国文学自身的独特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作为文学思潮存在的，它们有特定的哲学基础、社会背景和理论纲领。例如，19世纪现实主义受到实证主义哲学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强调客观、冷静地解剖社会。而浪漫主义则是对启蒙运动“理性至上”的反拨。将这些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套用在先秦时代，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1.《诗经》的“写实”并非为了“客观”，《诗经》的创作目的，无论是官方的采诗“观风俗、知得失”，还是民间的“言志”“抒情”，其根本都指向情感表达，而非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那种对社会进行科学般客观描绘的意图。它的“真”，更多是情感的真挚，而非描摹的逼真。

2.《离骚》的“浪漫”源于本土文化，而非哲学反叛。屈原的奇幻想象，与其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哲学选择，不如说是深深根植于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巫觋文化。诗中的神游、降神等情节，是楚文化宗教想象的艺术再现，而非欧洲浪漫主义那种对古典主义束缚的刻意反叛。其强烈的“自我”，也与封建士大夫“忠君爱国”的特定身份认同紧密相连，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所强调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自我。

总结一下，反对方的核心逻辑是：简单地贴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标签，会简化甚至扭曲《诗经》和《离骚》的文化内涵，忽视其在中国本土批评体系（如“风雅”“比兴”“骚体”）中的独特价值。

我们了解和熟悉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明确上述问题的来龙去脉。如果万一真题考到了这道题，我们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具体使用而言，我们的建议是：审慎地借用，并最终回归本土语境。我认为，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拒绝这些概念的借鉴价值，也不能不加反思地滥用它们。区分“精神/因素”与“主义/思潮”，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我们可以说《诗经》中蕴含着丰富的“写实精神”或“现实主义因素”，但不能轻易地将其定义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同样，《离骚》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浪漫情怀”与传统，但它不属于“浪漫主义”这一特定的文学思潮。前者是描述一种创作倾向和美学风貌，后者则是进行严格的文学史分类。前者是开放的、描述性的，后者是封闭的、定义性的。

在研究和表达中，借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术语，可以作为一座便捷的“桥梁”，它能让我们迅速把握《诗经》和《离骚》最显著的美学特征，这在入门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时，我们必须超越这种标签化的认知，回归中国古典文学自身的批评体系。分析《诗经》，我们更应着眼于“风、雅、颂”的体制功能和“赋、比、兴”的艺术手法。解读《离骚》，则应深入探讨其“骚体”的文体创新、“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以及其与楚文化、巫风、士人政治理想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术语和视角，才能更精准、更深刻地揭示作品的本质。

总结下来就是：我们可以有条件、有区别地借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来描述《诗

经》和《离骚》的某些美学特征，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种比附和类比，绝不能将其作为最终的定性和分类。真正理解这两部经典的关键，始终是中国自身的文化和文论传统。

十五、试述《诗经》和《离骚》比兴手法的异同（▲▲▲▲）

《离骚》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诗经》开创的比兴传统，二者在运用上既有相通之处，也有重大的区别。

（一）相同点：核心功能一致。两者都运用“比兴”手法，借助具体物象来寄托和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

（二）不同点：

1. 从“客体”到“主体化”。《诗经》中的比兴之物多为独立的“客体”，与所咏之事、所抒之情是“二物”，物我之间界限分明。例如《关雎》的“关关雎鸠”只是为了引出淑女君子之情。《离骚》中的比兴之物则被“主体化”，物我合一。作者将自身的人格、品德、情感完全投射到“香草美人”等意象上，使这些物象成为抒情主人公人格的外化和象征，达到了“物我相谐”的境界。

2. 从“零散”到“系统化”。《诗经》中比兴的运用多是片段式、零散的，服务于局部诗句或单个篇章，如《硕鼠》通篇以鼠喻剥削者。《离骚》中比兴的运用是系统化、贯穿全篇的。诗人构建了一个庞大而严整的象征体系，如以佩戴香草象征修身，以恶草比附奸佞，前后呼应，形成了一个寓意清晰、形象鲜明的象征世界。

3. 从“偶有寄托”到“普遍寄托”。《诗经》中，并非所有比兴都有明确的政治或道德寄托，许多起兴仅仅是为了协韵或起头。后世经学家常对其进行穿凿附会。《离骚》中比兴手法的运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明确的寄托功能，几乎所有核心意象都承载着作者强烈的政治理想与身世之感，是其思想和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六、试论《九辩》的艺术特色及其与《离骚》艺术上的异同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是楚辞由屈原向汉赋过渡的重要作品，其艺术成就斐然，但与《离骚》在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

（一）《九辩》的艺术特色。

1. 开创了“悲秋”文学的母题。《九辩》最杰出的艺术贡献在于对秋景的细腻描摹和对秋日悲情的深刻抒发。开篇“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将自然界的肃杀萧条与士人失志的悲戚、羁旅的孤独融为一体，创造了情景交融的悲秋意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悲秋”主题的滥觞。

2. 精于铺排与细致描摹。作品继承了楚辞善于铺排的特点，但在描摹上更为工细。如写秋景，从宏观的天高气清，到微观的草木枯萎、蟋蟀哀鸣，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层次分明，极富感染力。

3. 语言清丽，音韵和谐。《九辩》的语言清丽流畅，句式同样参差错落、韵散结合，但相较于《离骚》的激切奔放，其音节更为和婉，情感表达也更为凄怨缠绵，鲁迅评价其“凄

怨之情，实为独绝”。

（二）与《离骚》的异同。

1. 相同之处：形式上，都采用楚辞的“骚体”形式，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悲慨。手法上，都善于铺排渲染，并运用比兴手法自标高洁。

2. 不同之处：《离骚》充满了“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和积极求索的政治热情，其悲愤是激昂的、抗争的。《九辩》的思想境界不及《离骚》高远。面对不公，宋玉更多表现为个人的哀怨与退守，缺少屈原那种心忧天下、至死不渝的崇高理想和刚烈品格。其情感基调是消极的、沉郁的。

